

# 间有一两字好

周克希

宋四家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中,米芾是佼佼者,平时也表现得很自负。但传世的《中秋字帖(中秋登海岱楼作)》却让我们看到了他责己严苛的另一面。这首《中秋登海岱楼作》,第一遍写好后,他觉得不满意,空一行重写一遍。写毕,在空行处写“三四次写,间有一两字好,信书亦一难事”,写至“好”时一行已满,遂转弯用较小字体把“信书亦一难事”写在第二遍写的诗句下面。写了三四遍,中间只有一个字是自己满意的,看来写字还真是一件难事啊。他的这种感慨,应该是很真诚的。其实,就我们所能看到的后两遍而言,写法差别似乎并不大,前面将“雨”误写作“雨”,后面亦仅在写好后稍作修改。

黄庭坚也有类似的情况。他曾说:“余在黔南,未尝觉书字绵弱,及移戎州,见旧书多可憎,大概十字中有三四差可耳。”先前没怎么觉得自己字绵弱(天哪,黄庭坚的字居然会“绵弱”),到了戎州,才感到以前写的字面目可憎,十个字中间大概只有三四个“差可”——勉强可以而已。



闲读抄

填过几次个人简历,每次都照例填写:“一至六年级毕业于上海柴油机厂子弟小学;初一至初三毕业于上海柴油机厂子弟中学。”

每次都有同事揶揄一笑问:“选只学堂在啥格角落?”我的母校因上海柴油机厂而立。上海柴油机厂简称“上柴厂”,是全国工业化内燃机生产领头羊,是一家万人大厂。1952年,上柴厂在股行路广阔的农田间造了14幢“二万户”房子和近20幢的3层楼尖顶砖瓦房,定名“工农新村”。当年一大批决心要为全国生产国内顶尖内燃机的上柴职工呼啦啦拖儿带女地奔向这块“火热的土地”,大有献了自身献子女的决心。1953年上海柴油机厂子弟学校在工农新村开班。

1958年夏,我入上海柴油机厂子弟小学,那时的工农新村已建有商场、菜场、卫生院、托儿所、幼儿园、缝纫组等,让我们生活很是便利。但那时这里没有公交车,出行就靠自行车或步行。最热闹之地便是离我们十站路左右的“五角场”。我们学生没有钱,都是步行去五角场玩的。我们小学的课程与一般小学无差别,只是五年级后便有每周半天的劳动课。1964年夏,我入上海柴油机厂的子弟中学,为六七届(初一班)。那时的工农新村又建起了几幢五层楼的房子。人口增加,校舍不够用了。上柴厂在近厂的黄浦江畔造起二排简易校舍,供初一到初三学生上课。上学去、放学回家我们都要走40多分钟的路。一路上的我们打打闹闹,追逐奔跑,还唱着“一

## 我的母校

季节

会儿哭,一会儿笑,两只眼睛睁开大炮,开到上海买面包”的小调。那时食物匮乏,吃面包是我们最大的向往。因为路远,我们每天上学都带着一铅盒冷饭冷菜,由上柴厂的后勤处给我们蒸熟后中午送到黄浦江畔给我们吃。我们班40人左右,其中不少是厂领导子女,但我们中午所带的饭菜几乎一样简陋。从初一开始,我们去上柴厂劳动的课时增长,难度增大,我们要学操控机床,如刨床、铣床、磨床等。这种劳动课还要评分的,我们都很努力地学,也做好了献身上海的准备。

初一下半学期起,各种各样的事情发生,很快我班新来的班主任、一个20岁的大姑娘韩慧芳老师察觉到了我的情绪,有一次悄悄拉起我的手说:“一个人的前途是要努力争取的,不在乎父母,听懂吗?”当时我忍住泪,拼命点了点头。可惜仅仅两年后,我的学生生涯就结束了。但是我们同学情师生情还是很深厚的。2014年春,我班同学相约苏州西山,为我们的班主任韩慧芳老师做70大寿。2023年5月,我班已经72岁的郑永和等9位同学远赴河北廊坊,看望84岁的老师尹长耕,这段跨越千里共叙60年师生情的事一时在廊坊传为佳话,成了廊坊报纸的头条新闻。

如今的工农新村四周又造起了股行一村、二村,明星一、二、三村,市光一、二、三村,国和一、二、三村,成为上海最大的居民住宅区之一,那里交通便利,各方面条件优越,被上海人称为“中原地区”。

## 谈谈人艺

蒋力

演、参演等多重身份。他导演的剧目是《日出》、《杜甫》和《正红旗》(与闫锐联手);他主演的剧目是《哗变》(饰演舰长魁格)、《杜甫》(饰演杜甫);他参演的剧目是《茶馆》(饰演松二爷)。五部戏,冯远征都有份儿。

我熟悉的《日出》,是二十多年前任鸣导演的版本,今看冯导的版本,几近观看一部新戏。可是又有原来的剧情、台词,甚至主演的身影缠绕着我的记忆。

任鸣版之前的版本,我看过刁光覃版,是欧阳山尊版的延续,那时我的年龄还小,只觉得演员的年龄偏老。《日出》是个“试金石”。任鸣版的前后,我还看过方舒主演的电影《日出》、金复载作曲的音乐剧《日出》、金湘作曲的歌剧《日出》。

冯版《日出》结束谢幕时,他以导演身份上台谢



蒋力



雨过琴书润  
风来翰墨香  
(书法) 丹长江

幕,还讲了几句话,其中一句的大意是谢谢观众对这种探索的接纳、对青年演员们的包容。

张眉教授跟我交流了她的感受。她不喜欢这个戏的舞美设计。她肯定了李石清和黄省三的一段对手戏,她相对失望的是陈白露,本来不多的戏份,演得都像过场戏。

我记得任鸣版的《日出》,远征是里面的一个角色,而今他是导演。如果有条件,人艺完全可以两个版本轮换演出,让观众去选择,也让剧院有选择的机会。人艺历史上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林兆华导演的《茶馆》就曾演了一阵,后来剧院决定恢复焦菊隐、夏淳导演的版本。于我而言,《杜甫》是新戏,编剧郭启宏是老相识。看过《杜甫》后,我的感慨是:最好的剧院,最好的演员。

我正式观看北京人艺的戏,始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不仅看过于是之演王掌柜,还看过他演老舍;看过英若诚演刘麻子和虎妞爹;听过夏淳、苏民排戏之余扯“闲白儿”,林连昆演《绝对信号》演《鸟人》,陪朱琳老师乘公交车去给年轻的戏剧爱好者讲课;不厌其烦地反复品味任宝贤、朱旭的台词魅力;与锦云院长把酒话戏;怅然于宗尧大哥的不幸早逝……欣喜的是在这本节目册中,又看到濮存昕、杨立新、吴刚、梁冠华、何冰等一代好演员,大都退休了,却还在为“北京人艺演剧学

这个标题是林清玄的,借来一用,是因为迟至今日才对“断爱”一词有了深刻的痛觉。

爱别离,包括方方面面,恋人断交,夫妻离异,亲人诀别,看似惨烈,却不是最难最痛的。这世间有一种别离是瓜熟蒂落,是父母与子女之间的“断舍离”。那疼,慢悠悠的,长长远远的,撕扯着心肺。这个过程对于子女是自然而然的,即使有些微的不舍,也不会有过多的痛感。这里的断爱,是指父母对子女的爱,当断则断,不能成为不必要的牵绊。民间有俗语:世上只有瓜恋子,哪有子恋瓜。这是大自然的规律,飞鸟走兽如此,草木亦如此。要不然,怎么会有《二十四孝图》?会有以孝治天下?都不过是一种带有强制性的仪式罢了。如今好多人不愿意生孩子,经济压力是一个原因,更重要的是看透了父母与子女的真实关系。说得好听,是孩子作为意念也好,作为上天的恩赐也好,他或她选中了你,借由你来到这个世界。说难听的,不过是两个相爱的人想爱情结晶,才把人家强行带到这个充满了变数的红尘人世。不管好听难听,总之一句话,孩子与父母各是各,是不相干的两棵树。在不能担保儿女平安生活一辈子的景况下,为儿女着想,不敢生;十有八九,儿女与自己的病、老、死没多大干系,为了自己,不愿生。

这是时尚,也是醒悟。无可厚非。父母与儿女从相互依恋到渐行渐远,是自然而然的过程,为什么会痛苦,会不舍?

对于老家伙们来说,痛,是不可避免的,不得不和儿女保持距离,不打扰小夫妻的恩爱无间,这叫明智。独自承受丝丝缕缕有生必死的冷风,接受空落落的无奈与寂寥,这叫智慧。人若活得久,都有这一天,除了接受和忍耐,又能怎么样呢?

派”的发展而尽己所能。

那日王燕问我:你多久没看北京人艺的戏了?我努力地回想之后,告诉她:在剧场的最后一个戏是林兆华导演的《白鹿原》,小剧场看的是任鸣导演的《榆树下的欲望》,线上看的是任鸣导演的《香山之夜》。

我退休后自京移居沪地十几年来,希望此生有机会按自己的选择,再看两部北京人艺的新戏,亦如遥望她的未来吧。

## 书香

邓伟志

在民进上海市委举办的读书会上献上这首诗:

翰墨史留痕,  
丹心大道奔。  
书香盈社会,  
读诵伴晨昏。



邓伟志

## 漫长的离别

马骥晨

前几年看过一部电影《飞屋环游记》,里面有一句话我一直记在心里:真正的死亡是世界上再没有一个人记得你。

听到这句话,我心里就会有一丝安慰:父亲并没有真正离开。因为他还如此清晰地生活在亲人们的记忆里。特别是我,他最宠爱的闺女。

关于爸爸的记忆是如此完整,时隔30年,那一幕幕、一帧帧都没有忘。只是我很少去触碰。因为那里不只有爸爸,还有我自己,那个在爸爸的宠爱下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我。

这一切,戛然而止于1994年7月的那一天,我和爸爸的离别。

前一年,爸爸被查出胃癌,在上海做了手术。术后两个月,爸爸从上海回到了凤台家里。果然,爸爸精神健朗,似乎病痛就像一阵风一样,已经过去了。过完春节。爸爸就急不可耐地回到深圳重新开始工作了。

1994年暑假,爸爸要从凤台开车去上海,为公司洽谈一些业务,并且到医院做术后复查。我跟爸爸说:“我也想去。”他欣然同意了。一路上有宝贝女儿做伴,他高兴还来不及呢。

这一路也许是我学生时代最开心的出行了。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跟爸爸谈天说地,一路欢声笑语地到了上海。

然而,变故发生了。爸爸去医院复查,癌细胞已经大面积扩散。我在当时是不明就里的,但是从长辈们凝重的神情中,似乎也知道了些什么。

爸爸要留在上海化疗,我则要回到凤台,准备高三提前开学。分别的时刻来到了。

爸爸开着车,送我到上海火车站,同去送行的还有小叔。盛夏的上海,烈日当头,我们三个人心里却冷如冰窖。我强忍着眼泪,在站台上跟爸爸告

别。火车开动了,我从车窗向外挥手,看着爸爸故作镇静的脸庞和坚强支撑着的身躯,慢慢地消失在视野中。那一刻,我的情绪崩溃了,眼泪如决堤的江河。

另外一些细节,是多年以后小叔告诉我的。在我乘坐的火车开走之后,爸爸再也撑不住了,走进火车站的洗手间,掩面而泣。小叔也不知如何劝慰。我终于知道,那一刻,父女二人的眼泪,在不同的空间流在了一起。

3个月后,爸爸去世了。

时隔30年,回想起那一天在上海火车站,我不是在和病重的爸爸离别,而是在和我人生的一部分离别。

过了几年,我大学毕业,来到了深圳。

后来,我成了家生了子。我多么希望那些人生大事可以得到爸爸见证。我记得小时候和爸爸吹牛说过“长大我要给妈妈买房子,给爸爸买车子”。当我终于可以做到这一切的时候,却已经无法和爸爸分享。

写下这些文字之后的几天,我从伦敦开车前往南安普顿,送二儿子去大学上课。30年过去,我很少像这次一样,完整地回忆与爸爸有关的事情。

并不是遗忘,更不是不想念,而是不敢缅怀。我甚至一度不敢翻看爸爸的照片。有时候我会觉得爸爸不但自己走了,而且带走了一部分我,总觉得没有爸爸的我也变得不完整了。

30年前挥别了病重的爸爸,也挥别了天真无邪、无忧无虑的自己。这是一场漫长的离别,需要用一生去消化。

随着年龄慢慢增长,特别是有了孩子之后,我渐渐明白,我只是把关于爸爸的记忆连同那个属于爸爸的小女孩一起放进记忆,很完整地保存起来。爸爸从来没有离开,一直住在我心里。

在邮票这片方寸之间,每一枚都仿佛是一个充满神秘与魅力的宝箱,它们或诉说着悠远的历史,或承载着深沉的情感,更流淌着炽热与细腻的梦想之光。在这个浩瀚的邮票世界里,有一位名叫钱昕逸的少女,她以画笔为舟,以邮票为帆,勇敢地驶向梦想的彼岸。钱昕逸,一个来自上海浦东新区周浦第三小学平凡少女,自幼便对绘画情有独钟。对她而言,画笔就像是打开五彩世界的钥匙,单调的画纸在她的笔下瞬间变得生动起来,色彩与线条交织出一个充满无限可能的奇幻天地。

命运的奇妙转折始于她认识了学校集邮辅导员陈琳老师,加入了“周浦三小少年邮局”。一个阳光灿烂午后,钱昕逸在少年邮局偶遇了陈琳老师。在陈琳老师的引导下,她翻开了一本本精美的邮册,那一枚枚精美的邮票如同一把把神奇的钥匙,瞬间打开了她内心深处一扇从未被发现梦想之门。当她凝视着那些精美的邮票图案时,心中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她也要设计一枚属于自己的邮票!

2020年底,“永远跟党走 逐梦新时代”全国少年儿童邮票创作设计作品征集活动开启。在陈琳老师的悉心指导下,钱昕逸踏上了邮

票设计的征程。陈琳老师,作为上海市浦东新区周浦第三小学党支部书记、集邮工作室主任及少年邮局辅导员,不仅拥有丰富的集邮知识和教学经验,更有一颗热爱学生、乐于奉献的心。她成为钱昕逸在邮票设计道路上最坚实的后盾。

## 师恩如光,梦想起航

晨临

陈琳老师先是为钱昕逸详细阐述了邮票设计的主题,鼓励她深入挖掘自己的生活体验和内心感受,从中探寻灵感的源泉。钱昕逸深受启发,脑海中浮现出旭日东升、高楼林立的上海城市景象。那是她眼中新时代上海日新月异变化的生动写照,与设计主题完美契合。主题确定后,陈老师与钱昕逸一同深入探讨画面的构思与创意,耐心地向她传授如何巧妙运用线条的韵律、色彩的情感和构图平衡等绘画语言,精准地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和创意。她俩对画面细节的雕琢可谓精益求精,无论是人物微妙姿态、细腻的表情,还是背景的烘托处理,都不放过任何一个可能影响作品品质的细节,全力确保作品的整体质量达到完美的境界。在漫长而艰辛的创作过程

中,陈老师始终给予钱昕逸温暖的鼓励和坚定的支持,宛如一盏明灯,照亮她前行的道路。经过无数日夜的辛勤耕耘,钱昕逸的儿童画作品《希望与梦想》终于完成了。这幅作品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着钱昕逸的才华与创造力之光,也折射出陈琳老师教学的专业性和引导力。2021年6月1日,是个特殊的日子,钱昕逸的邮票作品成功入选《儿童画作品集》特种邮票。这份荣誉不仅仅是对她个人才华和辛勤努力的认可,更是对她通过作品所传递的“希望与梦想”这一美好寓意的深深赞许。

在即将于上海举办的亚洲邮展的璀璨舞台上,钱昕逸的邮票作品也将登台亮相,彰显青少年的卓越才华与无限创造力,传递积极向上的正能量。陈琳老师也将秉持教育初心与热情,在集邮教育之途矢志不渝,继续启迪和培育更多有梦学子。邮缘人生美轮美奂,满是故事与情感。愿每个有梦之人都勇敢追梦,让生命因梦想而更精彩!

## 十日谈

邮缘人生

责编:郭影

二十年前,我开始涉足集邮,就被精美的邮票牢牢地吸引住了,而且一发不可收拾。